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核心概念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文化

[英] 弗雷德·英格利斯 著 韩启群 张鲁宁 樊淑英 译

Culture

当前

“文化”是这样地流行

以至于人们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
不使用“文化”这个词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

事实上

是人们选择了“文化”这个词语

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

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核心概念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文化

[英] 弗雷德·英格利斯 著 韩启群 张鲁宁 樊淑英 译

Cultur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

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 言

一本书的简介近似于对一个人的介绍，相同点或许在于，两者都没有多少人在听。即便如此，也必须指出本书绝不是一本介绍最新的与文化相关联的书籍的简短目录，在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书有很多。而且我也承认，当前学术写作的习惯是或多或少都会收集引用一些别人著述中的一些陈腐观点，然后每隔几个句子的末尾都加上零星的注释以致破坏文章的整体形式。对我来说，这种学术习惯似乎是故意地将思想灌注笔尖，引领急切的读者进入有形的文字中。

相反，我所要做的事有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一部依据被称之为“剑桥历史主义”的史学观，遵循该学派伟大的创始人昆廷·斯金纳（我很骄傲能称其为朋友）的史学观而创作的概念史。其次，这本书就关键概念在学术上和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空洞性以及实用性提出了论题和讨论。最后，我试图通过他们文化的责任感来打动读者，引导每位读者关注文化富有挑战性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的存在，我们才拥有自我的意识，强烈感觉到生活是如此有意义。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按照波利梯出版社感觉敏锐、令人敬佩的读者的要求写作的。2002至2003学年度，在康涅狄格大学人文研究所任驻所研究员期间，又重新将其改写。在此，我很高兴能够书面感谢研究所所长迪克·布朗，他阅读了《文化》最先的初稿，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还有秘书约安·魏德以及研究员克里斯·克拉克，感谢他们的仁爱、热情和我各种各样求助的耐心。前面已经提到的昆廷·斯金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启发。克里尚·库马尔，现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在我访问期间，毫无保留地给予我很多意见。格雷姆·默多克在最需要帮助时给予我指导。里查德·豪威

尔斯总是在我求助时伸出援助之手。而保罗·特里和苏珊·霍杰特也在书稿刚完成时就审读了书稿,并认真善意地提出了很多意见。最后,我要把本书献给萨莎和哈丽雅特,她们承担了很多和文化相关的工作,并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目 录

I / 前言
1 / 第一章 概念的起源
32 / 第二章 文化与政治
55 / 第三章 文化与人文科学
78 / 第四章 文化与救赎:文学和批判
104 / 第五章 文化的社会生产
131 / 第六章 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真、善与美
165 / 注释
183 / 参考文献
194 / 术语对照表

第一章 概念的起源

I

当前,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不用“文化”这个词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政府检察官在关于学校的报告中会涉及“失败文化”,在关于监狱的报告中会提到“保密文化”;社会学家、新闻评论员和道德观察家们也会无一例外地很乐意提及我们共同生活、行动和存在的“消费文化”。而在近一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学家已经将民族研究视为不仅拥有文化且其本身就是“其他文化”——对于有些作者而言是非常“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尽管此处没有必要使用轻蔑的笔调),也常常会是自给自足或者完全自治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全球化,在这样的压力下,上述用词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人们日常对文化的谈论中去。

确实如此,文化对话思想构成文化概念自身,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面详细论述。或许,人类认知中最深奥,当然也是最有吸引力的难解之谜存在于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想象以及将其组合给我们的词语间(包括概念)的动态关系中。

在此,我用的是“组合”,而常用的词汇则是“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67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

struction of Reality)¹,该书影响之大,已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思想院系和分析模式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我们可以视这一点为社会建构主义流派的特点,而社会建构主义者指的是那些相信我们的现实世界是由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建立(构建)的人,他们会带着这一信念进一步探讨各种问题。因此,我们所谓的“那里的世界”(world-out-there)是所谓那里的世界与我们语言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直接结果。人类试图将世界或多或少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当概念和人类的自我理解与事实相遇之际,现实就变得物化了。

上述观点在学术思想界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我们也必须给“现实”加个引号,这样才能强调其作为人们探求目标这一建构性甚至创造性的地位。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任何有关现实世界一成不变、经久不衰的论断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人类缺乏认知的力量,现实世界是不可能被理解和认识的。必须补充的是,很多人对这一观点顶礼膜拜,甚至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为此,约翰·瑟尔²对这个论断作了修正。在他看来,认为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疑是眼睛、大脑、事实、事物和话语交流的产物的这一论述是非常准确的,但是这些交流的事实绝对不是给现实加引号的原因。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感知及概念(我们也将其应用到其他事物及其特性里)来构建的事物也绝非真实,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将其构建的。

这些冲突与“文化”在各领域的日趋显著正好一致,与文化所指的人类行为中任何事物也完全呼应。人们往往会认为破产公司肯定处于“猜疑文化”中,认为“文化侵略”就是商界本身的特点,或者认为——正如某著名人类学家对其所研究的群体所做的——一些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家庭包揽了“贫穷文化”³。当他们这样认为时,他们正试图抓住某些本来属于人类自身的、压力很大但又似空气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同时也完全是一种技巧,一种人类的创造,如同空气一样的自然、必不可少。

人们选择词语,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

要讨论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就最近的哲学争论作一评述,谈谈什么是概念,概念做什么,以及“概念框架”(我们可以使用也可以不用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词语),这个框架自从启蒙运动使纯粹理性易于为人们理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们。

有关概念形成的观点提供了一些哲学支持,这为本书学术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我们在梳理核心概念“文化”的历史时,不能简单地从探索其最早的用法开始,这可能会有帮助,也可能适得其反。《新牛津词典》里列举了五六个词条,包括马修·阿诺德 1876 年给出的著名定义,稍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它。尽管托马斯·莫尔早在 1510 年就作过关于“文化和(人们的)心智的益处”的论述,但是早期发现的文化概念大都是用于与园艺等相关的术语。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在十九世纪时“文化”是和人类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直到阿诺德生活的时代才发现“文化”这一用法指的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

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提醒我们在找到合适的称呼它的词之前,人们可能就已使用这一概念了。正如我们不断指出的那样⁴,即便是“运用概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给文化这个概念编写历史之前,最好弄清楚什么是概念和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有了概念。J. L. 奥斯汀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很远,认为“在对概念的‘起源’、‘获得’和‘形成’等问题的专门讨论中,我们要么被告知没有任何东西,要么全是些无稽之谈”。但是,如其哲学中常见的那样,奥斯汀决意不再探求所谓的“普遍概念”(衍生于可能见到和经历的事情却又被归纳成头脑中抽象的“观念”的那些定义)。就个人对概念的理解而言,他认为“概念的起源普遍被认可——在此可以说——要用知识来发现,而‘这是个未知数’”(斜体为作者加)。

奥斯汀深信词语的历史就是其被使用的历史,正如在本章开篇之处所指出的那样(与文化呈现的某些模糊语境有关),习惯用法或许会变得不再被使用。但没人会质疑文化这个概念的有用性,也不会否认

这样的事实：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是从浑浊的水中慢慢显现的。人们知道在这阴暗的水中有有用的珍贵宝藏，但却不知道这宝藏是什么。昆廷·斯金纳警示我们说：“对某一相应术语的正确用法的理解并不是接受这个概念的必要条件”⁵。他的论述是要说明约翰·密尔顿如何在缺乏词汇本身来表达的情况下明确而专心地证明诗歌写作的原创性。“原创性”(originality)一词直到密尔顿过世后一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间才进入英语。

此外，斯金纳又认为，“对某一相应术语的正确用法的理解不是接受这个概念的充分条件。也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和康德都对此研究过)，即自己仍然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概念，哪怕这种认为本身事实上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可以应用某一术语，听众也对此表示认可，但是概念的内容和意义非常丰富以至于谁也无法就当时的意义达成一致。斯金纳举的例子是“存在”(being)和“无限”(infinity)，但他同样可以将其命名为“文化”。最后，他得出结论道：“语言使用者的整个群体有能力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些术语。但是，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概念与他们任何一个统一用法相对应。”⁶ 他给那些追根溯源的人的建议是：在观察某些词汇发展变化时，可以在社会交往中发现新概念的诞生。然后这些新概念可以被用来区别意义，并且逐步被用来确定使用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中，概念的意义更加明确固定。(这并不是要将矛盾的意义剔除：很多含义丰富的概念，包括文化，往往包含相互矛盾的意义。)

这又使我们回到在我们称之为启蒙运动时文化的早期面貌。那个时期，理性主义和有关人的各种理论史无前例地涌现，并大约在公元1700年左右获得广泛接受。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充满来自于奥斯汀和斯金纳伟大思想的十八世纪，他们认为，使用概念时只需做的是：运用它。这并不是个中立的理论，相反它是个评价工具，执行其特殊的任务，对理性及修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很难将“文化”运用于分歧与反对中。)

II

伊曼纽尔·康德的第一个也是最执著的一个被误读的观点是：有一物质现实世界，其中，上帝给予的纯粹推理能力可以准确地找到语言的或者是象征的镜子（最可靠的一组象征符号被认为是数学）。在这里眼睛要看清任何事物，大脑一定已经掌握了如何解读眼睛看到的一切，“无概念无感知”即是康德上述论点的标记，随之而来的是他构筑的心智大厦。在康德看来，我们每个人可以将思维过程和观察的形式转变成知识的基础。与生俱来的想要理解自然的本能使我们有了“超验性的”理解框架，“理解本身就是自然的立法者”是他最有名的论断，紧随其后的还有“我必须舍弃知识为信仰让位”这样的名言。既然没有了任何选择，心智相信为其安排而看到的一切。

称康德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巨人无疑是恰当的，他把个体的人的作用置于创造的核心。通过这个途径，创造性地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世界，使其找到可居之处。对那些已经开始掌握这一概念的他的同时代人（在他们中不包括康德），文化是“概念框架”的形式和内容。

在启蒙运动眼花缭乱的光环下，康德是最耀眼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启蒙运动在突然短暂消逝后又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席卷整个欧洲，接着又从北欧向西横跨大西洋，并深深地扎根于在北美定居且拥有土地的那些说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的富人中。但是，如同所有耀眼的人类思想的迸发（往往照亮黑暗，让人不知所措，有时还会使人的视野变得一片黑暗），启蒙运动也使它的预言家们朝着不同的方向探索，目光盯着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一时期，所有的知识精英已经皈依的希望之光并没有指出任何一条通向未来的进步光明大道。起初，它只是出现在欧洲，后来成为帝国现象。然而，这束光在触碰到伊斯兰或印度教思想的领域时熄灭了。启蒙运动对有神论的法则和对教条的强悍冲击

力也只有在欧洲以及后来地缘上受欧洲控制的地区才能被感受到,遭受启蒙运动致命一击的是基督教的上帝。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也得像公元 1750 年以后的思想家一样,沿着两条分开的路走下去。每一条路都要求我们对“文化”的早期定义做一简要梳理,尽管总是存在争议和矛盾,但这个词一直表示的是一个内涵连贯、所指一致的概念。任何一个这样的定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必须依赖于它的用法,而不是虚构想象某一假设的确定意义。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会聚合(也会丢失)物质和精华。人们在反对概念的错误使用时,实际上是拒绝在运用概念时作任何细小的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肯定是错的,而是指不应该为了维护意义的确定性提出反对意见,而应该更多考虑如果意义改变之后会失去什么。

所以,当启蒙运动思想的领袖踏上进步的康庄大道时,并没有怎么用“文化”这个古老的词汇来描述那个时代的精神,不过也确实对人类作了诠释。在这一诠释过程中,思考、感受和言语的方式衍生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究竟真正如何的数据,并和一组关于世界应该如何的规则之间的紧密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个思想与行动之间不错的组合将带来有利于美好社会形成的社会制度和法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便诞生了宪法(*constitution*)思想这一新生力量。

从文化的其他相关形式来看,这个词传统上被简单地视为与立法有关,在美国第一部立法取得长期成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不过,这个词源的力量是连续性的。首先,这个词指制造或形成某物的行为;第二,它指事物组成的本质,即结构或构成的本质;第三,只有《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⁷ 承认习惯性赋予这个词的政治和立法方面的定义。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constitution*”一词暗指了这个词创造世界的特性。(“*constitution*”可译为“宪法”、“构成”、“构造”等——译者注。)也就是说,在美国宪法里规定的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政治准则本身也在炮制、塑造并体现国家的道德力量,而这一力量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则组

织、构建并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当代人文科学家经常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还有其派生的形容词),并由此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运用这些主要术语时,比如“合理”、“合法”、“承诺”、“支付”、“公民”、“公正”、“合同”、“权利”、“权威”、“证据”、“信任”、“事实”、“自由”等,我们可以依据我们自身所理解的意义。因此,我们能有思想,能感觉到激情,能掌握行为。思想、激情和行为只有放在相关概念的框架下并按此框架的概念进行解释,才能为我们按其所指来认识。

认为文化具有使人类行为明显且各有特色的有效力量是确定文化概念和意义的方法之一。个体完成某个动作,观众解读这个动作并归纳该动作的特点和性质,然后也再现这个动作;文化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具体说来,文化能够帮助区分同一个动作的不同表现,然后将这些表现归为不同的群体。换言之,文化教给我们如何区分,比如说,英国与意大利的礼节,阿根廷和日本的艺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管理方式以及中国和埃及的医学。

这些便是文化区分的成果,同时也是些例子,说明什么是不同的概念体系。这些文化区分的成果可以构建或者实现具体动作,这样一来,体现在动作中的思想就可以在其行为、运动、线条和顺序中表现出来。但是,当人类理性的伟大传道者们大约自公元 1750 年起开始启迪大众时,即当伏尔泰、歌德、康德、孟德斯鸠、休谟、孔多塞、黑格尔、狄德罗和伯克利一起驾驭着新思潮的潮流,认为可以由此将人类从枷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那样做的信念是相信一些教条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便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启蒙工程”。它教授科学中最基本的原则,并可以扩展到任何其他物质客体,包括人本身。科学与其后在技术名目下的实际发现和具体运用代表了人类战胜自然的巨大胜利。通过对现象的独立观察以及控制试验(以检验解释这些现象的假设是否正确)使科学本身成为可能。这些检验只有当假设是错误时才是绝对的

正确和有效,也只有在自始至终不是这种情况时才是确定的(正如大卫·休谟高兴地指出,今天是这种情形,明天就不一定如此了)。因此,科学知识就在仔细思考、小心求证、大胆推测和果断放弃的缓慢过程中前进。⁸

科学方法在最初的兴盛时期(出现在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产生了它的原则。伽利略和笛卡儿是科学之路的首批预言人,他们通过辩论和举例以侵蚀神学的极权主义思想。第一次颠覆古老的神权统治和明显压迫的是英国,那里的人民推翻了君王的统治。在这具有亵渎性质的致命一击之后是英联邦的成立,紧接着是皇家学会的成立,这些都是紧密连贯的。皇家学会是一个组织,正如该学会中第一个最敏锐的史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指出的那样,皇家学会的目标是“检验真理”(参照原文表述),“上下求索”,“铲除时代垃圾”,实现诗歌与自然哲学(其实他指的是科学)的分离,寻求发现“自然因果关系的真实渠道”。所有这些均要求正确的“话语方式”,是“最纯洁简短的一种话语,不但表述严密直白,而且表达方式自然积极,清晰达意,有着天生的简单,使所有的东西尽量和数学一样简单易懂”。⁹

启蒙运动的狂热者令其追随者们阅读笛卡儿,学习伽利略,要求他们视神学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私事,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样做以后,连散文都受到斯普拉特医生处方的诸多影响,哪怕是在法国。这样,社会本身则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笛卡儿曾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由设计师规划的城镇相比,已发展成大城市古城都规划得非常糟糕,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启蒙运动目睹了熟悉的现代角色的到来,即社会规划工程师。自然哲学(比如让·雅克·卢梭)教会我们从人的各个方面区别普遍人性,这个象征性的形象,必须是男性,被大写成了“人”(Man),并被卢梭发现受困于他所有人性的可能性之中,“生来自由,但……处处受到禁锢”。¹⁰

在他们看来,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科学是为理性提供知识的方法,由此自由友善的社会才能在将来被勾画

并得到保证。世界从迷信和野蛮黑暗的幻想里最终实现“觉醒”；在一则法国大革命残忍野蛮的笑话中，最后一位国王是被最后一位牧师的肠子绞死的。只有当“世界觉醒”时，即世界从迷信和野蛮黑暗的幻想里最终实现“觉醒”，在这样的笑话中，人(Man)才能继承自由和公平。

这便是一幅通向理性和世俗救赎的宽阔大道和敞开之门的画卷。理性神圣之城的文化将是纯净、光彩四溢的事物；在那里，存在与转变将是透明、平静和理性的；街道是由大理石铺就，无任何斑点，人与人的关系是可平等的，而且是缘于理性自由的平等；自然自身很平和，富有远见，而且可随时听候人类的召唤，但不是开发性的利用。

然而，人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历史状况才能想象出这样的乌托邦社会，男女两性必须共同努力去思考。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精力主要在此，却忽略了人人皆知的人间真理。第一位最重要的历史决定论者是普鲁士的黑格尔，他在世纪之交撰写了其著作。但他之后的思想家兼改革者们全部都只是决心完成一件任务，即销清、处理旧有的专制主义政权，铲除迷信还有它的传播者。总而言之，确保理性社会的到来。这场变革的主要倡导者是英国人杰里米·边沁，他在长寿的一生中做了令人称奇的学术哲学研究，内容详尽而广泛，且都与为制定国家政策而提出的实用建议紧密相关(法国革命者曾邀他起草新宪法)。他提出功利主义的原则(其中简单的公理是“最大数字的最大益处”)仍然是当代大多数政治规划的基础。

这些人深信美好社会应该是有理性的规划、正义面前的平等、可靠的社会保障和形式的统一。在边沁之上耸立着康德的两部巨著《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和《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启蒙运动?》(*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那是]……人从自我招致的幼稚中出现。幼稚就是如果没有外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而表现出的无能……理性为其客体提供理解和有意的使用”。康德一旦将“纯粹理性”体系化，该体系即可用来系统地研究政治。“依据某一原则的一致/统一”¹¹会为世界作出最佳的排序，这里的

原则指的就是系统的推理。大公无私的人,比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非常清晰地解释了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现实中。

III

反对系统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文化概念对于反对意见的提出是必不可少的。启蒙运动将人文科学推崇为一个真实系统,认为自身已经解决了政治问题。政治与社会方法相互联系,一旦理性把这项内容教授给所有人类社会,那么残忍、欲望和战争也会根除。“高尚的政治科学”(十九世纪的用词)¹²会给人类带来天堂,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再希冀来生的天堂或期盼掌管天堂乐园的救赎者。

文化的第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所有的东西。它的始作俑者是与康德是同时代的德国人 J. G. 赫尔德。赫尔德首次提出了强大的启蒙传统,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态是各不相同的,这在今天看来是个很普遍的概念。他批评系统推理的一维性,解放了事实与方法间的非常自信的固定关系,在历史的千变万化中发现了一种人类价值的物理学,难以预计并且相互对立,其不可同化的粒子在使进程后退的同时让生活变得有趣。

赫尔德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都是围绕文化进行的。我们会看到,这一概念相当复杂棘手。他几乎就没有用过文化这个词,但正如斯金纳所言,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使用、研究这个概念,而且他还做得非常广泛深入。

值得关注的是,在赫尔德的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那些词汇最终会在文化的一个应用范围里体现出文化这个概念。(概括力强的概念将其典型的成语聚集于周围。)他使用这些词汇自如而又富有激情,根据多种学术研究的规范提炼词汇,以至于只要他的时代允